



军事思想史纵论

毛泽东

◎ 刘庭华 著

(c) 军事科学出版社

晴日麗江長素
江山如此多嬌
萬里長城永不
敗葉滿地秋風





卷之三



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纵论

刘庭华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纵论/刘庭华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80237 - 104 - 0

I. 毛… II. 刘… III. 毛泽东军事思想 - 思想史 IV.
A84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2289 号

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纵论

作 者: 刘庭华

责任编辑: 张晓明

封面设计: 刘 丹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104 - 0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2. 00 元

销售热线: (010) 66767216 62882626 传 真: (010) 66768547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储运部联系 (010 - 66767383)



序 言

寿晓松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之际，刘庭华同志撰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史论丛》一书付梓出版，我颇感高兴并表示祝贺。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夺取正义战争、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南。因此，作为军队领导干部、军事理论研究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应为题中之义之事。刘庭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史论丛》一书中，作了艰辛的探索，本书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的各个方面。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问题而论史论理，且史论结合，以论带史，论从史出，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以厚实的战例、战史为基础。作者既论证了马列主义军事学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干”，又阐述了毛泽东批判汲取西方军事思想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精华，充实自己军事理论宝库的内容，提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三个理论来源的观点既简要概括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期和阶段划分，又有探



讨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运筹的专题论文，既有研究毛泽东指导某一历史时期建军作战的经验总结，也有探讨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后发制人策略与《老子》、《周易》等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渊源关系；还有研究毛泽东战争美学观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充分反映了作者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同刘庭华同志一起进行过毛泽东军事思想课题的研究，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严谨扎实，追求创新，可以说是刘庭华做学问的一个突出品格。他在80年代初军事科学院举办的军事理论干部研讨班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根据地”的科研思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来院从事军战史研究已经30多年，研究目标十分明确，一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与中国历史文化，而且是在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后，再扩大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的研究。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者的“升华”之路。军战史的研究与军事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就能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提高。
他认为，研究战争史到了相当的程度后，应该升华到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层面。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严谨治学、探索创新的学术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有鉴于此，是为序。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战略学分会会长）



目 录

序言	(1)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个理论来源论之一：	
“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	
——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学说的	
继承和发展	(1)
(一) 毛泽东一生发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1)
(二)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学说的	
继承和发展	(7)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个理论来源论之二：	
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其欧洲血统， 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	
——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国化问题	(12)
(一) 古为今用，古籍今解	(13)
(二) 取精用弘，推陈出新	(16)
(三) 毛泽东善于采用传统历史文化的思维和 语言表达军事思想	(23)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个理论来源论之三：	
毛泽东对西方军事思想文化的批判汲取	(25)
(一) 毛泽东对西方军事思想文化的研读	(25)
(二) 毛泽东对西方军事思想的批判	
汲取与创造	(29)
(三) 毛泽东批判汲取西方军事思想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纵论

科学方法	(34)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期和阶段划分	(38)
(一) 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初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萌芽	(38)
(二) 第二个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初步形成	(46)
(三) 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成熟	(73)
(四) 第四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极大丰富和发展	(85)
(五) 第五个时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防建设过程中继续充实和发展	(124)
五、“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之探析	(147)
(一) 从枪杆子夺取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	(147)
(二) “农村包围城市”之认识与发展	(151)
(三)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产物	(156)
六、四渡赤水的作战指挥艺术及历史昭示	(163)
(一) 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化被动为主动， 夺取战场主动权	(164)
(二) 实施高度迅速机动，在运动中寻机击破 敌军合围	(168)
(三) 运用虚实行动，巧妙造势，迫敌就范， 各个击破敌人	(170)
(四) 四渡赤水作战指挥艺术的历史借鉴启示	(174)
七、抗日战争与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思想的成熟	(176)
(一) 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	(176)

目 录



(二) 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人民 战争思想	(183)
(三) 科学阐明持久战的理论和 军事战略总方针	(185)
(四) 首次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189)
八、英明的战略指导，伟大的历史胜利	
——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 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	(193)
(一) 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 绝对领导	(196)
(二) 适时进行整训，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204)
(三) 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 武装力量组织体制	(207)
(四) 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自己	(210)
(五) 军队发展规模应与战争形势和 人民负担能力相适应	(215)
九、毛泽东建军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的新发展	3
(一) 提出并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 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发展了军队内部 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220)
(二) 提出恢复和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原则，确立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223)
(三) 提出军队是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相 统一的思想	(224)
(四) 重视野战兵团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226)
十、人民解放军军事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	(229)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六字诀与	



诱敌深入	(230)
(二) 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与基本的是游击战， 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230)
(三) 解放战争时期：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与以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 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等十大军事原则	(231)
(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 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 避强击弱	(232)
(五)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采取积极防御 战略方针	(232)
十一、毛泽东对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的战略运筹 及启示	(236)
(一) 对于台湾当局的军事骚扰挑衅，或利用 国际形势挟洋自重闹事，应予惩罚与 教训，而掌握其主动权的关键是看出手 的时机与力度	(236)
(二) 必须把对台斗争置于国际战略大格局中来 筹划，严防国共两党之战演变成中美之战， 始终把台湾海峡军事斗争锁定在国内战争 门槛内	(245)
(三) 军事斗争完全立足于独立自主，斗而有度、 有节；外交斗争应采取“主动攻势的必须 形态”	(251)
(四) 把金门、马祖作为台海军事斗争的重要 “棋子”（或绞索）来利用，制造和扩大 美蒋矛盾。毛泽东采取联蒋抗美的方针： “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暂不收复	

目 录

金门、马祖，使蒋军守而不撤，挫败美国 划峡而治的阴谋	(255)
十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261)
(一) 积极防御的内涵、本质和突出特点	(262)
(二) 积极防御战略的历史演变	(265)
(三) 积极防御战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70)
十三、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	(279)
(一)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爱好终生	(279)
(二) 毛泽东将中国历史文化运用于革命战争的 创造性贡献	(283)
(三) 毛泽东批判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 历史启示与意义	(293)
十四、孙子的造“势”与毛泽东的“创造战场”及 理论创新	(297)
(一) 孙子的势、任势与战势	(297)
(二) 毛泽东的“好打的敌人”与 “创造战场”	(300)
(三) 关于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 造势问题	(306)
十五、《老子》军事思想要义与毛泽东后发制人的 战略策略	(312)
(一) 老子从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道”的 理念出发，提出了“兵者不详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和反对“以兵强天下” 的战争观	(313)
(二) 老子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 天下”的治国平天下理论，提出了以退为 进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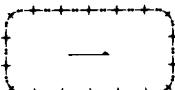




毛泽东军事思想史纵论

(三) 老子提出优秀将帅应具备不逞强、不激怒、 不硬拼和谦虚团结人的德才要求	(318)
(四) 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对后世军事思想和 毛泽东的影响	(319)
十六、《易经》的“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与 毛泽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	(322)
(一) 提出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战争 指导思想	(322)
(二) 实行刚柔相济的军事策略	(324)
(三) 确立“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	(326)
十七、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毛泽东战争 美学观撮要	(335)
(一)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对战争的本质作了最为科学的剖析和概括， 极大地讴歌了正义战争、革命战争的 内在之美	(335)
(二) 毛泽东从推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出发， 热情讴歌了革命战争的外在形式之美	(338)
(三) 毛泽东采用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形式讴歌中国革命战 争的壮阔之美，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革命性的开 拓，注入了新的活力	(339)
后记	(344)

一、“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个理论来源论之一： “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 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谈到马列主义中国化时说，毛泽东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已有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同世界的思想，同产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也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这种评述不能说完全科学准确，但却形象而生动地大体上概括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

(一) 毛泽东一生发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曾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在寻求救国救民的探索中，毛泽东

^① [美]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第 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在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为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他发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作为指导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去，使之成为自己军事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既是毛泽东阅读马列著作的一条根本方法，也是他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军事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1929年，毛泽东为了在红四军内对党员和部队进行理论教育，曾致函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购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现译名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等。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已经形成。但随着王明“左”倾路线推行“积极进攻战略”，毛泽东的正确军事原则被指责为“消极防御路线”、“狭隘经验主义”。1932年10月，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排挤出军事领导层，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执行。为了坚持正确的主张，说服对方，毛泽东更是发愤学习马列的著作以掌握有力的理论思想武器。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研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特别是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对指导毛泽东反思中国革命战争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他在《两种策略》上眉批：“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② 1933年秋，毛泽东将《“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时，在书上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② 《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①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陈独秀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另一方面，他又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战争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危害革命事业。在革命战争中，政治路线的“右”和“左”的错误，直接影响到军事斗争指导的正确与否。军事指导上同样存在“右”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因此，毛泽东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年代仍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特别是马列著作。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仍不间断，患病时躺在担架上还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64年3月，毛泽东风趣地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我是在马背上学习的马列主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在延安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他曾先后于1936年9月7日、9月26日和10月22日，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刘鼎、叶剑英写信，要他们广为搜集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和军事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泥的《街头讲话》等，并提出：“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②

另一方面，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并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更加集中精力，发愤研读和不断搜集新增加的马列主义的著作，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军事史等方面的书，这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

① 《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版)、《理论与策略》(收入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西洛可夫、爱林堡合著由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以及米丁著由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联共(布)党史》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毛泽东表现了极大兴趣和偏爱。对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一书,毛泽东称赞“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1937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出版,毛泽东认真读了全书,并写了十几页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毛泽东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在延安杨家岭办公室内召集哲学座谈会,成立新哲学研究会,并请艾思奇当哲学顾问。这些都使毛泽东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掌握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来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经验,从而使毛泽东在读马列著作中找到了以哲学为工具,实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而马列主义的哲学则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

4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其中吸收马列主义及其军事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内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道:“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第一而且根本的要求。”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批注:“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



一、“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而且不是唯物论。”^①书中分析主观唯心论者是“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毛泽东批注：“机械论是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左与右的相通，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②

毛泽东在哲学上的深厚造诣，为他科学地研究军事问题，正确地总结战争经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7年7~8月，毛泽东亲自给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课。流传至今的著名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就是他当时的讲授稿，《实践论》、《矛盾论》则是这个讲授提纲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毛泽东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其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原文达24处之多。同时阐发了如何以实践的观点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方法，来认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没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决不轻易动笔写作。1938年1月，毛泽东致函艾思奇，谈到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打算时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③

由于毛泽东苦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能够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实际以及形势的迫切需要，在写给艾思奇的信数月后，即于同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蜚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军事著作。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